

走好敦煌研究之路,引领后学四通八达

——项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启示录

赵义山,张芷萱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项楚先生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主要集中在对以王梵志诗、变文和歌辞等为代表的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大面积精细校订与准确释读,帮助众多读者能够顺利地读懂这些文献。这既有助于恢复敦煌俗文学文献之真貌,又方便后学利用这些文献展开研究,从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便是项先生的大贡献、大功德。巡礼项先生的敦煌学研究,可见其文化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的艰苦磨砺,尊重学术、礼敬前贤的谦逊态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卓绝贡献,津梁后学、沾溉文林的永久功德。全面总结项先生敦煌学研究的成就与影响,以及项先生的治学路径和学术品格,对于继承项先生敦煌学研究,从而不断地将敦煌学引向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敦煌学;王梵志;敦煌变文;敦煌歌辞;项楚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9)05-0001-11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9.05.001

说起敦煌学,国外学者不论,但就中国已经作古的前辈学者而言,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闪光的名字: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陈垣、陈寅恪、王重民、向达、王庆菽、姜亮夫、任半塘、潘重规、季羨林、周一良、启功、曾毅公、蒋礼鸿、周绍良等等,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虽不专治敦煌学,但在 20 世纪上半叶,也一同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项楚师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敦煌学研究,便是在前辈们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向前开拓发展的。探骊得珠,后出转精,数十年间,项楚师以惊人的学识和毅力,完成了《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等堪称项先生敦煌学研究(以下简称《项学》)里程碑似的著作,由此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面貌,将我国建设成了世界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将敦煌学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其崇高的学术成就,被人誉为“中国人文学术的标杆”^[2]。

敦煌学最基础的工作,无疑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学者们所做贡献,我们以为通常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文献搜集整理、汇录传播,其学术价值在方便读者能看得到;二是精细校订、准确解释,其价值在帮助读者读得懂;三是理论思考、系统总结,其价值在引导读者见得远;或贡献其一,或贡献其二,或三者兼之。通观项楚师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其跨越文史,涵盖文学、语言、文字、音韵、历史、社会、民俗、宗教、哲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考订研究,虽不限于前述三方面价值中某一方面,但其核心所在,则是通过对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大面积精细校订、准确解释,从而帮助读者能顺利地读懂原始文献,正确理解原文的文学与文化意蕴。项楚师近四十年用心专一,其所做大贡献在此,所立大功德在此,其影响后学亦

【收稿日期】2019-08-20

【作者简介】赵义山,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及古代词曲研究;张芷萱,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词曲研究。

在此。此前,学界虽有同仁对项先生的治学特点和某些方面的贡献有简要介绍和评论,但缺少全面、系统的总结,通过梳理,这对完整地了解项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影响,从中获得应有的启示和教益,以此促进敦煌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平生功业在敦煌

项先生《杜马屋存稿》中,除收录《〈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敦煌变文新校》等敦煌俗文学文献研究文章之外,还收录了《寒山诗籀读札记》《卢全诗论》《苏轼诗中的行业语》《〈文心雕龙札记〉的审美影响》《读〈管锥编〉札记》等论述唐宋诗及其他文史杂著的文章,可见其学术视野所及,虽专注敦煌,却又并不囿于敦煌而较为宽泛。但通观项先生敦煌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白话诗、变文和歌辞等通俗文学文献的考校与释读。

(一)以《王梵志诗校注》为代表的唐代白话诗整理研究

从项先生发表的论文看,其敦煌学研究,治理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几乎同时起步。就对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王梵志诗的校释而言,前辈学者在20世纪前期的著述,如刘复《敦煌掇琐》、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已经开始辑录或论述敦煌石室中发现的王梵志诗,到20世纪后期,赵和平、邓文宽发表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3],稍后,张锡厚出版了我国第一个王梵志诗的较全的辑本《王梵志诗校辑》^[4],鉴于这两部著作在校勘和注释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项先生开始了王梵志诗的校释工作。这一工作似开始于1981年,到1985年完成。项先生曾在1986年10月回忆说:“本书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约撰,初稿写作于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其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集打算全文发表,因于同年年底将初稿誊清付之,现在再对这部誊清稿加以修订,呈现给读者。”^[5]³³这部约五十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在1987年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集全文刊载;其后经增补修订,于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了79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此后再经增补修订,于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约八十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在校注和增订这一书稿的过程中,项先生陆续发表的论文有:《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梵志诗十一首辨伪》(《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王梵志诗释词》(《中国语文》1986年第4期)、《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梵志的一组哲理诗(校释与评论)》(《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苏藏法忍抄本王梵志诗校注》(《南开文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列1456号王梵志诗残卷补校》(《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诗三条材料的校订与解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敦煌写本斯四二七七王梵志诗校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王梵志诗中的他人作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这些论文,记载着项先生进行王梵志诗校订和注释的艰辛足迹和收获,与集大成的《王梵志诗校注》一起,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其大面积的精审的文字校订、阐幽发微的诗意确释,以及诸如“‘王梵志诗’绝不是一人所作,也不是一时所作”的重要论断等,为王梵志诗的顺利研读,可谓拨开了重重迷雾,由此赢得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和赞誉。日本著名汉学专家入矢义高盛赞道:“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①日本的中原健二教授亦赞扬说:“本书的最大特点可说是注解中的旁征博引,其校勘的精确也证明作者的渊博学识,读者会被本书引用的大量文献所折服。尤其是作者自如地引用了佛教经典、《太平广记》,乃至以变文为主的敦煌文献,而且又皆中鹄的,不能不使人为作者的广收博

^① 入矢义高:《评〈王梵志诗校注〉》,《中国图书》(日本)1991年第1期,转引自张涌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项楚师的敦煌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引而瞠目结舌。”^①1998年,《王梵志诗校注》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可谓实至名归。

项先生与唐代白话诗研究相关的重要著作,还有《寒山诗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敦煌诗歌导论》(巴蜀书社2001年版),以及与张子开、谭伟、何剑平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寒山诗注》曾于2002年获四川省第十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唐代白话诗派研究》曾于2007年获四川省第十二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第二批十种优秀成果),2009年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些著作与《王梵志诗校注》一道,在唐代诗歌发展史研究中别开新境,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学术影响。

(二)以《敦煌变文选注》为代表的敦煌变文整理研究

自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1920年4月在《东方杂志》发表《敦煌发见唐朝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以来,收藏于敦煌石室中的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便逐渐进入我国学人视野。罗振玉《敦煌零拾·佛曲三种》、刘复《敦煌掇琐》等开始零星收录和刊布这类说唱文学作品,郑振铎先生1931年3月在《小说月报》发表《敦煌俗文学》一文,率先使用“变文”这一名称来指称这类通俗的说唱文学作品,并在其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其加以论述,尽管后来学界对这一名称展开过一些争论,但“变文”一名最终还是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而沿用至今。自此以后,变文之辑录、考释、论述者日渐增多,仅就文献辑录、考释而言,继罗振玉、刘复之后,有向达所辑《敦煌丛抄》、周绍良所编《敦煌变文汇录》,可谓踵事增华,门径大开;至1957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合作校订的《敦煌变文集》问世,算是这一工作阶段性的集大成著述;1959年,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释疑解难,嘉惠学林甚多。时隔二十多年后,直至1983年,中国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问世,补《敦煌变文集》篇目之缺,纠校录之误,再将这一工作向前推进一大步。尽管如此,但因这种文献的特殊性,正如项先生所言,今天的读者“存在着三个主要的障碍:一是原卷文字错讹满纸,夹杂着许多俗字别字,有时达到‘难以卒读’的地步。二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唐五代口语词汇,这在当时虽然是一听就懂,今天的读者却感到索解为难。三是其中有许多描写佛教题材和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由于时代的变迁,今天的读者就十分隔膜了”^{[6]7}。因此之故,前述《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等,仍不免有不少失校、误校、失解、误解之处,依然使读者难以逾越前述三个障碍,正是有鉴于此,项先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进行王梵志诗校注的同时,也便开始了敦煌变文的选注工作。

从项先生《敦煌文学丛考》中收录的有关变文考论的文章看,这项工作以《敦煌变文语词札记》一文起步,亦开始于1981年,至1988年11月10日为巴蜀书社即将出版的《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版)写下前言,项先生敦煌变文整理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终于圆满结束。在这8年之间,记录着项先生关于变文探考足迹的主要成果有:《敦煌变文语词札记》(《四川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敦煌变文校勘商榷》(《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文学杂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史遗书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伍子胥变文〉补校》(《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维摩碎金〉探索》(《南开学报》1983年第2期)、《变文字义零拾》(《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本〈孝子传〉补校》(《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庐山远公话〉补校》(《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补校》(《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古籍整理研究》第27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敦煌变文语词校释商兑》(《中国语文》1985年第4期)、《〈破魔变文〉补校》(《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降魔变文〉补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敦煌文学杂考》(《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敦煌文学研究漫谈》(《文史知识》1987年第12期)、《敦煌变

^① 中原健二:《评项楚著〈王梵志诗校注〉》,《中国图书》(日本)1994年第6期,转引自张涌泉《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项楚师的敦煌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5期。

文字义续拾》(《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载《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这些成果后来大多收入《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所解决的问题,也都集中呈现到洋洋 72 万言的《敦煌变文集选注》(巴蜀书社 1990 年版)之中了,二书作为姊妹篇,一同展示了项先生在敦煌变文研究中校异文、纠错讹、补遗缺、析疑义、辨异说、释纷争、复原貌、发幽微、寻真意诸方面的扎实功底、深厚学养、聪明才智、谨慎态度和综合实力,其杰出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令国人惊叹,也令世人敬仰。中国台湾学者、著名敦煌文学研究专家潘重规教授特为此发表长篇书评,由衷地赞叹说:“项楚教授是国内研究敦煌学的一位杰出专家。由于我见闻所限,只能看到他的部分著作,但尝鼎一脔,早已令我心仪不已。”^[7]“觉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裨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赏奇析疑之余,不能自己的逢人‘说项’。因此,写成此文,向海内外同好们一吐心声。”^[7]“底本中许多看来是断不可通的错乱文句,经过作者精心校理,终于怡然理顺,豁然贯通。”^[7]“统观作者此书,从一字一句的解释,到通篇大意的熔贯,原作使用文字的特性,写作时代的环境背景,都一一加以透视,详细说明。凭借作者丰富的学识,精密的心思,把几乎僵化了的作品,又活泼泼地重现眼前。使我读后获得无比的乐趣;不敢独享,也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7]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江蓝生先生也合撰《评项楚〈敦煌变文集选注〉》一文,充分肯定其成就:“这部《选注》既吸收了蒋礼鸿、潘重规、徐振堃等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又融汇了作者本人多年来潜心研究的心得,在校勘和释义两方面都有很多创获,可说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8]并以大量例证,论说此书的 3 大优点:“(一)校勘精确”^[8]“(二)释义恰当”^[8]“(三)广征博引,说解透辟”^[8]。日本著名汉学专家入矢义高在评论《敦煌文学丛考》时说:“本书是由国际著名的项楚氏所著的,集其多年敦煌文学研究精粹之大成的著作,乃其前年所出大著《敦煌变文选注》的姊妹篇。对其渊博深厚的学养及不知倦怠的猛烈钻研精神,我唯有钦佩叹服之份。日前在此领域堪与项氏匹敌的,恐怕唯有美国的 Victor H. Mair 氏了。”^①《敦煌文学丛考》一书,曾在 1995 年获得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项先生在完成《敦煌变文选注》之后,并未就此停步,而是继续向前开拓,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增补工作,其陆续发表的论文有:《〈维摩诘经讲经文〉补校》(《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5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敦煌本〈燕子赋〉札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5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令章大师李稍云》(《中国文化》1991 年第 4 期)、《佛经故事与中国古小说》(《菩提》1992 年第 10 期)、《关于〈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一段唱词的校释》(《敦煌研究》1992 年第 4 期)、《敦煌变文语词校释》(《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敦煌变文新校》(《岁久弥光》,巴蜀书社 2001 年版)、《〈庐山远公话〉新校》(《中国文化》2001 年第 17—18 期)、《〈维摩诘经讲经文〉新校》(《四川大学学报》2005 年第 4 期)。在 1997 年,项先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敦煌变文研究”,其结项成果《敦煌变文选注》(二集)原拟单独出版,后来与《敦煌变文选注》合在一起,分为上、下编,由中华书局在 2006 年出版了《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选入篇目,由原来的 27 篇,增加到 44 篇;字数由原来的 72 万字,扩展到 115 万字,真正是洋洋大观了。

项先生在大约四十年前进行敦煌变文研究的同时,其高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资深教授张涌泉教授,也与他的硕士导师郭在贻先生及其同门黄征教授一起,在敦煌学的另一重镇浙江大学完成了以《敦煌变文校注》为代表的重要成果,与项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一起,共同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推向高峰。2014 年,项先生作为首席专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变文全集》,张涌泉教授也加入这一研究项目,东、西敦煌学研究的两大重镇紧密合作,必将再次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以《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为代表的敦煌歌辞研究

项先生在完成《敦煌变文选注》之后,在 1997 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敦煌变文研究”之前,曾有五年

^① 入矢义高:《评〈敦煌文学丛考〉》,《中国图书》(日本)1992 年第 2 期,转引自张子开《项楚与敦煌学研究》,《中国文化》2001 年第 17—18 期。

左右的时间投入了敦煌歌辞的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原本也是大家云集。自王国维于 20 世纪初在《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观堂集林》卷 21)中首次披露敦煌写本所载《凤归云》《天仙子》《望江南》《菩萨蛮》等曲子词以来,引起罗振玉、董康、刘复、朱祖谋、龙沐勋等人的兴趣,他们相继展开辑录,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最终完成了《云谣集杂曲子》的辑录工作。其后,词学及文献学前辈专家周泳先、冒广生、唐圭璋、王重民等都有敦煌词钩沉辑佚的撰著,其中最重要者是王重民先生在 1950 完成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曲子词集》,收词 160 余首,是第一部收录作品最多的敦煌歌辞专集。继王重民之后,任二北先生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先后出版《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二书,并在约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了《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这一集大成的著作,全书七卷,共收录作品凡 1300 余首。任先生是唐代声诗、歌辞及元散曲研究大家,贡献卓著。尽管任先生在敦煌歌辞的校释中也取得显著成绩,但因敦煌写本文献太过特殊,索解不易,因此,《敦煌歌辞总编》中“待校”者甚多,因对一些俗字、俗语、史实失察,对部分佛典、佛语、佛理不明,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少,再加之随己意误校、误改、误判者亦多,因此,在给读者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甚至误导。有鉴于此,项先生又对《敦煌歌辞总编》进行了长达五年左右的匡补工作,记录这一工作的主要阶段性成果有:《〈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上)》(载《中国与日本文化研究》第 1 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1 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文史》第 35 辑,中华书局 1992 年版)、《S5588 号写本之再探索——〈敦煌歌辞总编〉[求因果]匡补》(《九州岛学刊》1992 年第 4 期)、《〈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二)》(《文史》第 36 辑,中华书局 1992 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三)》(《文史》第 37 辑,中华书局 1993 年版)、《敦煌本〈行路难〉之再探讨》(《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天津出版社 1993 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四)》(《文史》第 38 辑,中华书局 1994 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五)》(《文史》第 39 辑,中华书局 1994 年版)、《〈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六)》(《文史》第 40 辑,中华书局 1995 年版)、《〈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 1995 年版)。

这些成果最终汇集成 18 万字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一书,由巴蜀书社在 2000 年出版^①。该书匡补任氏《敦煌歌辞总编》之错讹或不当,皆以“楚按”二字标出,据我们初步统计,书中出现的“楚按”,多达 560 余条,而每一条“楚按”下面,其纠谬、正讹,或一处、或数处,保守估计,全书所匡补之处,当数以千计,这对于敦煌歌辞的正确释读,真是功莫大焉。

综上所述可知,项先生在以王梵志诗、变文和歌辞等为代表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整理研究中所付出的辛劳是何等巨大!其帮助读者正确阅读敦煌文献的作用又是何等重要!假如没有这些纠谬正讹的项氏著述,普天下读者因误读原始文献而导致的郢书燕说,当不知凡几!

二、沾溉文林启八方

当无数读者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等著作的帮助下读懂敦煌文献之后,藉以研究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民俗、音乐等等,便可以各逞所能,各见其长了,故以之为参考文献而写成专著之中外学人,不知凡几!其接受沾溉启迪之八方学子,又不知凡几!我们仅以《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三书出版之后,在期刊和硕博论文中的参考引用情况做一简单的检索统计,便可概知一二了。

(一)《王梵志诗校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诗歌研究是比较大众的学科,而唐诗研究,又是长期居于古代诗歌研究首位的,所以《王梵志诗校注》被参考引用的概率要高于其他两种著作而居于首位(见表 1)。

^① 按:据项楚师 1999 年 10 月 20 日所作序言可知,该书初稿曾由中国台湾林聪明教授收入《敦煌丛刊二集》,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95 年 1 月出版,因未经本人校对,错误甚多,后经校改补充,改由巴蜀书社出版。

表1 《王梵志诗校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期刊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备注
1987						
1988						
1989						1.《王梵志诗校注》初稿,1987年由
1990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1991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
1992						集全文刊载;其后再经增补修订,于
1993	2				2	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
1994	4				4	版;其后再经增补修订,2010年由
1995	1				1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1996	1				1	
1997	2				2	
1998	2			1	3	
1999	2				2	
2000	3				3	
2001	4	1			5	
2002	8	1	2	2	13	2.表中数据不包括项先生本人论
2003	7	9	5		21	文。
2004	9	7	3		19	
2005	12	7	9		28	
2006	17	15	7		39	
2007	18	11	8	2	39	3.参考引用《王梵志诗校注》的论
2008	17	1	13	1	32	文篇数,如按学科分布统计,如下:
2009	20	6	8	1	35	哲学与人文 539篇;社会科学 16
2010	14	6	10	2	32	篇;信息科技 30篇;经济与管理
2011	14	11	10		35	21篇。(按:不同学科之间有交叉
2012	19	6	9		34	重复)
2013	23	8	7	1	39	
2014	22	5	11		38	
2015	18	5	8	1	32	
2016	30	6	8	1	45	
2017	21	4	7		32	
2018	14	4	13		31	
合计	302	113	138	12	565	

(二)《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

《敦煌变文选注》与《王梵志诗校注》两书出版的时间相近,后者之初稿比前者早三年面世。但如果就正式独立出版的时间而言,《敦煌变文选注》还比《王梵志诗校注》早一年,但《敦煌变文选注》的被参考引用数,却比《王梵志诗校注》还少了九十余篇,其原因已如前述,因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散文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如诗(见表2)。

表2 《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期刊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备注
1991						
1992						
1993	2				2	
1994	2				2	
1995	1				1	1.《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由巴
1996	2				2	蜀书社初版;2006年由中华书局
1997	3				3	出版增订本。
1998						
1999	8				8	
2000	4	1			5	
2001	5	2			7	2.表中数据不包括项先生本人论
2002	3		2		5	文。
2003	11	4	1		16	
2004	7	6			13	
2005	5	1	1		7	3.参考引用《敦煌变文选注》的论
2006	5	5	2		12	文篇数,如按学科分布统计,如
2007	8	5	6	2	21	下:哲学与人文 430篇;社会科学
2008	19	3	8		30	8篇;信息科技 56篇;经济与管
2009	19	2	6	1	28	理 17篇。(按不同学科之间有交
2010	23	2	4	4	33	叉重复)
2011	22	6	10		38	
2012	24	6	8		38	
2013	25	6	6	1	38	
2014	21	4	8		33	
2015	23	3	11	1	38	
2016	17	6	11		34	
2017	25	2	8		35	
2018	17	4	5		26	
合计	301	67	97	9	474	

(三)《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

相比之下,《敦煌歌辞总编匡补》被参考引用,要比前述两书少得多(见表3),虽然此书相对晚出,但

这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则，与诗文相比，词曲相对属于小众学科，其关注度不及诗文；二则此书当年由地方出版社出版且仅印 1000 册，社会流传不广，很多人只知有《敦煌歌辞总编》，但却很少知道还有一部十分重要的《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故此书本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真是学界尤其是词学界的一大憾事。

表 3 《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出版后被参考引用情况统计表

年份	期刊论文	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备注
2000						
2001	2				2	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最初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于 1995 年出版，因未经本人校对，错误甚多，后经校订，在 2000 年改由巴蜀书社出版。
2002	1	1			2	
2003	2	2	1		5	
2004	1	4	1		6	
2005	1	1			2	
2006	2			2	4	
2007			1	1	2	
2008			1		1	
2009	3	1		2	6	2. 表中数据不包括项先生本人论文。
2010			1	1	2	
2011	3	2			5	
2012	2		1		3	3. 参考引用《敦煌变文选注》的论文篇数，如按学科分布统计，如下：
2013	3	1	1		5	
2014	2	1	2		5	
2015		1	1		2	哲学与人文 63 篇；社会科学 1 篇；
2016	4	1	2		7	信息技术 13 篇；经济与管理 5 篇。
2017	2	1	2		5	
2018	5		1		6	(按不同学科之间有交叉重复)
合计	33	16	15	6	70	

因为事冗时仄，又因眼疾读写不便，项先生其他著作被学界引用情况，尚未能一一考察；未进入知网检索系统的专著和部分以书代刊的论文集，也无力涉及；对《王梵志诗校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三书被参考引用的情况，也仅仅只考察了中国大陆，还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欧、美、日、韩等地，也都尚未纳入考察范围；但是，仅中国大陆而言，其接受影响的学科范围、学者范围、地域范围，便已十分广泛。就学科范围看，从知网检索的大门类可知，其参考引用项先生著作的大学科门类，便有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等等；如果从学者层次来看，有教授、博士、硕士，有专门研究某一方向的学者，也有一般的社会读者；如果从接受影响的学者之地域分布而言，就更是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各地了。项先生近四十年来孜孜不倦地进行敦煌文献的校订考释，尽最大努力帮助学人读懂敦煌文献，正确理解原文献的意义，从而进行各自的深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项先生的这种大面积精准考订与校释，仿佛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位披荆斩棘者，以自我一己的辛劳，为八方学子的前行，开辟了道路，扫除了障碍，其艰苦卓绝的贡献，必将赢得凭借其大著的津梁而四通八达的学者们永久的崇敬。

三、刮垢磨光守护志

全面总结项先生对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贡献，仔细考察项先生的治学路径及其成就和特色，能让我们获得多方面的启示和教益。

(一) 文化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

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只有接受过人类优秀文化的人，才有坚定不移的文化守护与传承意识。文明智者自觉守护与传承文化，反之狭隘自私地占有甚至无情地糟蹋，此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经常想，凡是以文化人自居者，就应该像项先生那样，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以文化的守护与传承为己任，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在这方面，项先生没有自我宣传，也没有慷慨之词和豪壮之语，他只是默默地、永不知疲倦地去做，不曾有过动摇，也不曾有过躁动不安，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眷恋着自己的那条冷板凳，但最终做出令世人敬仰的成就和贡献来，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所谓学为人师，身为世范；正所谓功到自然成，德高声自远。

项先生 2011 年 9 月 10 日晚曾在四川大学做过一场学术报告，一位研究生同学曾用手机记录下报

告的内容,并将其整理后发在网上。其中有不少项先生报告原话的记录,有一段原话是项先生回忆当年在敦煌的一段工作经历:

我当时拿到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可以打开莫高窟所有的洞门。那段时间,我真的能感受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的心中有一种朝圣的感觉,忘掉了一切,好像敦煌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9]

记录完这段原话之后,那位同学又用自己的话简述道:“但他又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只是个临时工,并没有认识到敦煌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意识到自己此时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只是想赶紧干完。但是有一天晚上的经历让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9]紧接着,那位同学又记录下项先生的另一段原话:

一个晚上我醒来,我的四周是一片寂静,那是一种有生命的寂静。我的视线里漆黑一片,只能看见头顶的星空。这时我好像听到了隐约传来的声音,仔细听了一下才发现那是莫高窟钟楼的铃铛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声音好像从远处传来,从历史传来,这声音是唐代的,是丝绸之路的声音。此刻仿佛我看到的壁画全部都动起来了。我知道我的一生将要与敦煌结缘。从此以后我抄写卡片不再是以一个临时工的心态来工作,而把它当做我的终生事业。^[9]

是的,从那时起,项先生就已经将敦煌文献整理作为文化守护与传承的“终身事业”,始终不渝,毫不动摇。要感谢那位研究生同学(可惜不知其名)如实地记录下项先生的原话,让我们可以随项先生的追忆,领略他那份立志献身祖国传统文化守护与传承的赤子之心、鸿鹄之志!

此外,项先生还曾在《敦煌文学研究漫谈》一文中谈到:

敦煌文学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创作,经过一千年的历史尘埋,今天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光彩。目前我正在写作《敦煌变文选注》,集中了变文中的精华作品详加诠释,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使这份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10]

项先生说得非常好!对于敦煌文献,“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光彩”,“使这份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项先生是这样想的,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便是一个文化人对于文化守护和传承的自觉的责任担当意识,有了这种自觉意识,才可能有终身无悔的献身精神。可以这样说,项先生的学问,不仅是以他的聪明才智在做,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的生命构成,以自己的心血和躯命在做。愚钝如我辈,虽不以敦煌学为终身事业而另有学科职责,但项先生之文化守护与传承之担当意识,敢不俚俚效之,以为楷模。

(二)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的艰苦磨砺

如果仅有文化守护与传承的责任担当意识,但没有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扎实功底和深厚学养,就只能是空怀壮志了。项先生之所以能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中取得举世闻名的卓著成就,除了他立志文化守护与传承的担当意识外,就与他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功底以及过人的聪明才智分不开的。但是,这深厚的学养和聪明才智,却并非得之于先天禀赋,而是出自于后天的勤苦积累和艰苦磨砺。

项先生在《敦煌文学研究漫谈中》回忆了他走上敦煌文学研究道路之后,因志在攻克阅读敦煌文献所遇到的俗字、俗语、佛典等“三个障碍”,于是重新学习、发奋苦读的情形:

敦煌文学(这里主要指敦煌俗文学)研究中有待解答的难题多如牛毛,因此我把继续攻克这三个障碍作为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

这就需要重新学习。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底。这一次则是埋头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例如《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全唐诗》等总集读了不止一遍,《太平广记》本是供查阅的,我也逐条读完,这就等于分门别类地读了许多古佚书的残文。在这个基础上,再旁及别的杂著乃至某些较偏僻的著作。

……

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搜集解决新的问题的数据,使知识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如此往复不已,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领域和治学门径。^[10]

如此关起门来苦读众多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甚至是比较偏僻的大部头僻书,肯下这种“笨功夫”的

学者,在当今学界,不知还有几人?即便还有其人,是否“笨”到了如此程度?在苦读中“使知识像雪球般越滚越大”,这便是“积学以储宝”的过程;而“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这便是融会贯通的本领;把这些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融会贯通地运用于诸多问题的考论和道理的反复寻绎之中,从而提高思辨能力,这便是“酌理以富才”的过程;总之,只有知识储备到位,思维训练到位,又善于融汇贯通,才能在问题分析和语言表达中显示出相应的智能和才华来。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怪词。”^[11]写作的训练与磨砺是如此,学术的训练与磨砺又未尝不是如此。项先生因其经过了超越常人的勤苦磨砺,所以能在敦煌文献的考校释读中,得心应手地、综合性地运用各方面知识,不断地对敦煌文献进行“刮垢磨光”,从而能复其真貌,寻其真意,把那些“多如牛毛”的问题,解决得妥帖圆满,这才不能不引起国内外同行权威专家们一致的折服与惊叹。诚如项先生所言:

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代学术研究已经显示出综合性的趋势。研究敦煌文学,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那么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功夫,就是必要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门门精通,可是学识的深广程度决定着学术成就的大小,却是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这个目标。^[9]

研究敦煌文学是如此,研究别的学科亦莫不如此,只有如项先生那样,经过艰苦的磨砺,把“笨功夫”下够了,方可有真正的学术成就可言的。

不过,想要下“笨功夫”勤苦磨砺,努力钻研,如果不能平心静气,而是心浮气躁,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项先生常常会给弟子们讲述《楞严经》中“月光童子”的故事,这是勉励我辈,在勤苦磨砺和发奋钻研中,应像月光童子“修习水观”那样,做到静如止水,澄如明月,方能静了群动,空纳万境,这样才能静心磨砺,刻苦钻研,学有所成,研有所得的。

(三)敬畏学术、礼敬前贤的谦逊态度

项先生深知为学不易,所以总是表现出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和对前贤的礼敬之意。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敦煌文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不限于中华文化)的一大幸运。多年来海内外敦煌学的研究,已使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学术门类有了长足的进展,而更大的进展则是可以预期的。作为这笔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人,我们应该对它怀有十分尊重的态度、十分珍惜的心情,努力去恢复它的原貌,阐释它的真义,使它在今天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万万不可去伤害它。我曾看见过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土文物的情景:那样仔细地剔除粘连在外的泥土,使古物焕发光华;那样小心翼翼地举手投足,唯恐给古物造成任何新的损伤。我们研究敦煌文献,虽然不一定接触原卷实物,可是对于文献的内容,也应该抱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每改一字,每立一说,都要力求做到证据确凿。^[12]

要像发掘出土文物那样小心翼翼地对待敦煌文献的整理,要“对它怀有十分尊重的态度、十分珍惜的心情,努力去恢复它的原貌,阐释它的真义,使它在今天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万万不可去伤害它”,项先生是这样说的,数十年如一日也正是这样做的。这种对古文献的“尊重的态度”和“珍惜的心情”,就正是对学术的敬畏之心。项先生上面的一段话,虽然是在特定背景下针对一些特定对象讲的,但对于我们每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而言,也是谆谆教诲。

正因为敬畏学术,所以,一定会礼敬前贤,这也是有良心的学者一种起码的品格修养。在这方面,项先生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项先生对那些为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做出了贡献的前辈学人,总是时时怀敬仰之心,随时不忘致感激之情的。如项先生在敦煌变文的考校注释中已取得显著成绩并赢得同行们由衷赞扬时,他没有忘记前贤在此道上有过付出和开创。王重民等六位先生在合作校订的《敦煌变文集叙例》中,曾谈到过他们校理敦煌变文的计划和步骤:一、校印本;二、选注本;三、影印本。但先生们仅完成了第一个计划。项先生在为《敦煌变文选注》撰写前言时说:

可惜由于当时的外界形势,六位先生只完成了校印本(即《敦煌变文集》)一种。现在,他们

中的王重民和向达两位先生已归道山,然而他们弘扬学术的不朽业绩和设计蓝图,却鼓舞着我们去继续完成由他们开始的事业。这本《敦煌变文选注》,可以说就是遵照六位先生关于“选注本”的设想而写作的。^{[6]7}

不仅对前贤的“不朽业绩和设计蓝图”心怀感激,而且将自己的贡献看作前贤的未竟之业,其谦逊态度,溢于言表。

再如,项先生在完成《王梵志诗校注》后,亦曾在前言中追忆前人的贡献,从刘复的《敦煌掇琐》、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一直追述到赵和平、邓文宽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以及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不忘前人为自己的研究提供的方便,并对所有帮助过书稿写作的先生一一致谢,并且不断在修订、再版《补记》《又记》中提及自己所得到的帮助,向曾经提供过帮助的人表示谢忱,生怕有所遗漏。在《增订本又记》中,项先生特别记录到:

半个月前我尊敬的季羨林先生仙逝了,犹记二十多年前,我在撰写《王梵志诗校注》的初稿时,得到了季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前辈周一良、王永兴先生、宿白先生的鼓励和扶持,初稿以手稿影印的方式,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全文刊载。往事历历在目,而哲人其萎,令我倍感凄怆,我在这里表达无限的感激和哀思。^{[5]41-42}

读着这些充满深情而几近感激涕零的文字,亦不禁令人对“哲人其萎”同生悼念和缅怀之情。

又如,项先生在写作《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时,首先充分肯定了任二北先生的成就和《总编》的学术价值:

任半塘先生的巨著《敦煌歌辞总编》,收辞多达一千三百多首,合歌辞与理论于一编,是目前这一领域收罗最广、用力最勤的总结性著作。今后一切研究敦煌曲的学者,相信都将以《总编》所达到的成就为立足点,由此出发去进行新的探索。^[13]

始终不忘自己的研究是在前贤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始终不忘前人的成就和贡献,始终对学术存敬畏之心,始终对前贤怀感激之情,这也是项先生示范给我们的学人品格。

项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影响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益,除上述几点之外,另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科学态度,精于校勘考据、擅长融汇贯通,熔语言、文学、宗教于一炉的治学特色,以及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卓绝贡献等等,海内外同行专家,以及张涌泉教授、张子开教授等诸位同门都曾多次言及,便无须再饶舌了。

四、相传薪火固津梁

项先生四十年来澄心静虑,勤苦努力地攻艰克难,以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为己任,以对敦煌俗文学文献的大面积精细校订与准确解释,帮助万千读者顺利地读懂原始文献为终身事业,从而不断地把敦煌学推向前进,既很好地守护与传承了祖国的历史文化,为中华学术赢得了持久的声誉,为中华人文学术“树立了标杆”,同时,其道德文章也为后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项先生对于敦煌文献,不知疲倦地求真貌、索真意,恰如韩愈《进学解》所描绘者:“爬罗剔抉、刮垢磨光”^{[14]146};“补苴罅漏,张惶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14]147};“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14]147}除了人类因科技的进步,其“继晷”无须再“焚膏”之外,其余则并无二致了。

项先生的学术追求,已经与敦煌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敦煌学已然成为项先生的生命构成,而项先生的敦煌学研究早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特色。所以,项先生的敦煌学研究很值得系统总结、深入研究。比如,项先生的治学理念、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等等,都值得全面总结,尤其是学术界对项先生不少研究成果的质疑、商兑,就很需要做全面的清理,选择和肯定那些在质疑、商兑中呈现出的一些真知灼见,剔除那些自以为是而想当然者的诸多谬误,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学术殿堂中对项学批评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通过这项工作,可以使项学更加大放光彩。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研究项学:就项学的形成、项学的成就、项学的特色、项学的评议、项学的传承与未来发展等等,展开系统总结与探讨,这对项学的承传有益,对敦煌学的发展有益。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项学,其实也是研究敦煌学的组成部分;总结和研究所项学,继承和发扬项学,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敦煌

学、发展敦煌学,是为了巩固和拓展以及更好地发挥项先生敦煌学成就的津梁作用,使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后来者,能够通过这一宽阔稳固的桥梁,顺利地到达自己学术理想的彼岸。

参考文献:

- [1]张子开. 显学中的敦煌学——项楚敦煌学论集·序[C]//项楚. 显学中的敦煌学——项楚敦煌学论集.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2]徐俊.《项楚学术文集》首发式致辞[EB/OL]. [2019-07-06].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856265.
- [3]赵和平,邓文宽.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J]. 北京大学学报,1980(5-6).
- [4]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项楚. 王梵志诗校注·前言[M]. 增订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6]项楚. 敦煌变文集选注·前言[M]. 增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7]潘重规. 读项楚著《敦煌变文选注》[J]. 中国文化,1990(3).
- [8]吕叔湘,江蓝生. 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J]. 中国语文,1990(4).
- [9]曦曦公馆的小窝. 听项楚口述学术史[EB/OL]. [2017-03-21].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DNYQ4tCSx.html>.
- [10]项楚. 敦煌文学研究漫谈[J]. 文史知识,1987(12).
- [11]周振甫. 文心雕龙选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31.
- [12]项楚. 关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段唱词的校释[J]. 敦煌研究,1992(4).
- [13]项楚.《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C]//项楚敦煌语言文学论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3.
- [14]韩愈. 韩愈文集汇校浅注:第2册[M]. 刘真伦,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Follow the Course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Guide Junior Scholars in All Directions

——Mr. Xiang Ch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Inspiration

Zhao Yishan, Zhang Zhix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Sichuan)

[Abstract]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 of Mr. Xiang Chu are mainly on the careful editing and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secular literary documents of Dunhuang represented by Wang Fanzhi's poems, literature of storytelling and ballad-singing, and ballads so as to help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documents. This is good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original state of Dunhuang secular literary documents, convenient for the coming generation to study these documents so as to better protect and inherit these valuable historic documents, and this is Mr. Xiang Chu's great contribution and merits. In Mr. Xiang's studies of Dunhuangology, we can see h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caring and inheritance, his diligent strive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truth exploration, his humble attitude of respect for research and predecessors, his scientific spirit of seeking the truth through the facts and evidence-based judgement, his great contribution of selection from vast material and painstaking polishing, and his everlasting merits and virtue of guiding younger scholars and benefiting the academia. The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Mr. Xiang achievements, influence, academic methods and virtu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his study of Dunhuangology so as to further promote this very study.

[Key words] Dunhuangology; Wang Fanzhi; Dunhuang literature of storytelling and ballad-singing; Dunhuang ballads; Xiang Chu

(责任编辑 第环宁 责任校对 包宝泉)